

贵族、农民与被血水浇灌出来的「自由民主」：并非「和平演化」而是精英无情把戏的「现代化」

评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

JokingKong · 2026-07-22 12:21

在描述宏大历史的阵痛时，很多作者都不自觉的生出一种近乎天真的温情，去涂抹那些嶙峋的骨骼。尤其是“民主的萌芽”这一话题，太岁作品都描绘成文明理性对蛮荒特权的温和劝导，或者把现代化的到来想象成一场所有阶层皆大欢喜的终极盛宴。可若将视线从那些高唱赞歌的教科书中移开，去打量一下那些真正托举起现代社会底座的旧日土地，就会发现现实从来没有过这种近乎慈悲的优雅。泥土深处散发的不是理性的芬芳，而是被时代车轮碾碎的骨血与汗渣。

巴林顿·摩尔在1966年出版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一书，便是这样一本硬生生挤进冷战学术阵营、将这种温情脉脉的幻象砸得粉碎的异端之作。彼时的美利坚学术界，正沉迷于行为主义的量化模型与单线史观的自嗨之中，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只要按部就班地工业化，就必定会理所当然地叩开西式议会民主的大门。然而，这位任职于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长期将目光撕扯于中俄农业基底之上的学者，却看穿了这种单线叙事背后的虚妄。

摩尔摒弃了那些花哨无用的数据模型，将英、法、美、德、日、中、印七国的历史巨幅画卷推倒重来，用长时段的质性比较，搭建起了一套震撼人心的三条现代化路径。他像一个在未知的历史灌木丛中负重前行的独行者，他的使命不是为了给后人修筑一条平坦的高速公路，而是用一种近乎笨拙却又极度缜密的姿态，帮我们辨识出那些隐藏在现代化神话背后的最令人讨厌的陷阱。

(一)

要真正看懂摩尔的野心，我们就必须跟随他的笔触，先退回到第一条道路的起点，去重新审视英国、法国与美国是如何在“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中撕扯出一条通往现代西方议会民主的轨迹。

在传统西方历史学家的笔下，英国的议会民主似乎是渐进主义的完美胜利，是士绅与贵族们在漫长的妥协与理性中开出的文明之花。然而摩尔却用极其冷峻、深邃、克制的史料考证撕开了这层

华丽的面纱，他告诉我们，英国的自由民主根本不是什么和平的恩赐，它建立在漫长、残酷且极具破坏性的暴力之上。17世纪的英国内战，作为一场暴烈至极的革命暴力，不仅砍下了查理一世的头颅，更在制度上彻底扫清了封建王权对土地商业化转型的最后抵抗。

但是，这远非暴力的全部形态。摩尔最为深刻的洞见在于，那些带来历史深远影响的暴力，往往是以一种与西方立宪民主道路并行不悖的合法框架悄然发生的。

内战之后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圈地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实施的隐蔽而长期的系统性暴力。圈地运动彻底改变了英国乡村的社会生态，土地不再是政治职能和封建义务的载体，而是变成了能够增加收入的投资。自耕农这些野心勃勃的激进小资本家和大地主们，通过议会的合法手段将土地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议会非但不是什么全民利益的代言人，反而变成了“土地资本家的工具”，甚至可以说，那时的议会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主委员会”，其内部的表决权从来不是数出来的，而是用土地和财富的斤两称出来的。星室法庭这把原本属于国王、在客观上能为弱势农民对抗圈地提供最后庇护的伞被彻底摧毁，英国的农民阶级在这场长达两个世纪的合法吞噬中被彻底摧毁。

于是，农民丧失了公地权利，沦为毫无土地的廉价劳动力，或者在饥饿的驱使下逃往城镇，变成工业革命早期工场里最凄惨的燃料。到了1832年，在受圈地运动冲击最迅猛的莱斯特郡，一个村庄里竟然有接近一半的家庭不得不依靠固定的济贫基金才能苟延残喘。但这恰恰构成了英国通往民主制度最坚实、也最残酷的底座：正是在这个彻底消灭了农民阶级的社会废墟上，英国清除了像德国、日本那样强大的乡村反动和保守力量，使得土地贵族和后来的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能够达成一种灵活而包容的议会机制。英国人的自由，是以英国农民的毁灭为代价的。正如摩尔所说：

「在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的过程中，革命暴力所作出的贡献可能与和平改革一样，事实上在英国，革命暴力也确实奏响了一场和平改革的序曲。但是，并非所有带来历史影响的暴力都是采取革命形式的。很多暴力也可能是在合法的框架下发生的，甚至是一种与西方立宪民主道路并行不悖的合法框架。内战之后产生并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圈地运动就属于这种情况。」

跨过英吉利海峡，法国的图景则呈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烈火干柴之势。英法两国的结构性差异，在十七八世纪的农业商品化浪潮中被无情地放大。法国的佩剑贵族在经历16世纪的物价革命后，未能像英国同侪那样成功转型为商业化的农业经理人，而是被路易十四那套凡尔赛宫的奢华游戏所驯服，变成了彻底依附于皇室专制主义的玩物。法国贵族在面对日益资本主义化的世界时，作出的回应不是去推动农业技术革命或推行圈地私有化，而是固守封建主义的旧有框架，利用手脚粗大的封建法律特权，从那些守着小块土地的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

摩尔笔下，资本主义在法国农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面具”进行渗透的，这使得古老的封建结构非但没有解体，反而被注入了一种畸形而病态的生命力，极大地加剧了乡村的阶级对立。与此同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成长轨迹也充满了荒诞的错位。由于君主制为了维持其穷兵黩武和骄奢淫逸的政策，疯狂地推行卖官鬻爵制度，法国的城市商业财富并未转化为推动工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独立动力，而是源源不断地流入了皇家金库，换取了贵族头衔和政治特权。

结果是，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封建化”，而封建贵族却没有完成“资产阶级化”。这种卖官制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皇室专制主义的支柱，但它也将国王的权力死死地束缚在既得利益的泥潭中。

当路易十六试图在上台后否定莫普改革、尝试对税制进行温和改良时，遭遇了整个买官贵族阶层极其顽强的抵抗，法国由此彻底丧失了走德意志式“自上而下保守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既然温和的改良之路被锁死，那么大革命的暴烈烈火便成为了历史唯一的破局方式。

在法国大革命的三次激进浪潮中，农民虽然不是城市里那些手握启蒙话语的知识分子的天然同盟，但他们作为乡村的庞大基底，最终成为了整场革命最无情也最彻底的仲裁者。1789年8月4日夜，正是全法农村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迫使国民大会不得不彻底废除封建主义的所有领主权利。

然而，农民的激进性是带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的防御性激进，当1793年罗伯斯比尔的雅各宾派政府为了应对战争而推行严厉的粮食征用政策、或者其宗教政策直接攻击到乡村传统社区的核心时，农民便毫不犹豫地掉转枪头，旺代地区血腥的反革命暴动就是这种保守天性的极端彰显。

摩尔以一种极其客观、冷静、不带一丝道德说教的笔调指出，恐怖统治期间虽然处决了约一万七千人，占当时法国人口的极小比例，但相比于旧政权统治下因为行政腐败和可避免的饥馑所造成的隐性死亡，大革命的暴力代价在长时段的历史账簿上反而是微不足道的。大革命虽然因为保留了小农财产而使法国的现代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显得步履蹒跚，但它通过暴烈的方式彻底摧毁了君主制、土地贵族统治和领主特权，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根基。法国贵族由于其自身的经济依附性，已经沦为自由民主最顽固的敌人，除了用暴力的烈火将其彻底化为灰烬，法国社会根本不可能像英国那样在旧体制的温床里演化出民主的果实。摩尔说得精辟至极：

「摧毁土地贵族拥有的政治权利是法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個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追溯到法国贵族一直以来对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中的农业问题所作出的回应。因为这些贵族阶层在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基础方面面临困难，因而可以被皇家专制主义驯服和掌控。正如托克维

尔很久之前就认识到的那样，法国大革命完成了波旁王朝的任务，即摧毁了可能形成右翼专制政权的一个不可缺的社会基础，这种右翼政权显现出的是在先进工业的冲击下最终会朝着法西斯主义发展的强烈倾向。」

摩尔的结论是：

「从大范围来看，法国大革命是部分地替代了一种并没有带上前工业时代特征的农业商品化发展进程，或者是对于该进程的另一种历史选择。」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新大陆，美国的经历则提供了一个在没有封建包袱的荒原上、如何通过最后一次资本主义革命确立民主基础的独特样本。美国虽然不需要像英法那样去清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领主特权与城堡，但其自身在内部孕育出的南方种植园奴隶制，却成为了政治与社会民主道路上最难以逾越的庞大障碍。到了1860年，美利坚合众国的版图上实际上并存着三种相互依赖却又在精神和结构上完全对立的社会形态：东北部蒸蒸日上的工业资本主义、西部自由农场主密布的商品化农业，以及南方由黑奴劳动力支撑的棉花种植园经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方的奴隶制绝非工业资本主义的累赘，它在经济上不仅以高利润姿态获利丰厚，更是全球棉花贸易决定美国经济早期发展速度的超级发动机。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对西部土地的疯狂渴求，南方种植园的扩张野心与北方和西部的利益发生了根本性的对撞。

摩尔在这里展现出了他作为一流社会学家的深刻，他无情地批判了那些将美国内战纯粹归结为道德废奴主义或者纯粹归结为关税经济决定论的浅薄论调。冲突的本质在于，南方的整个社会价值观和话语体系，都是为了给其奴隶财产的合法性进行教条式辩词。这种以人治和强制为基础的制度，从神经中枢上就深深地刺痛并威胁到了北方关于自由、法律和契约的资产阶级核心概念。

当185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北方工业对保护性关税的迫切需求，与西部农场主对免费《宅地法》的渴望交织在一起，而南方种植园主则在每一项提案前都筑起了死守的防线。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问题是绝对无法通过政治分赃和谈判来妥协的，但当这些问题作为一个利益整体时，它们就构成了根本性的不可调和。北方的幸运在于，其工业资本家成功地越过了南方的政治阻击，与西部自由农场主结成了极其坚固的政治联盟。这一场打着“为你的农场投票——为你的关税而投票”旗号的阶级结盟，构成了美国的“钢铁与小麦”联盟，它在根本上决定了美国的命运，使其与后来普鲁士德意志那套“钢铁与黑麦”的反动联盟走向了完全相反的终点。

林肯治下，北方军队以一种毁灭性的整体战粉碎了南方的抵抗，这场内战，在现代世界形成的坐标系中，其重要性至少与英国内战和法国大革命推翻君主专制一样重要。然而，摩尔紧接着用一种毫无粉饰的笔调揭示了这场革命胜利后的灰色底色。内战结束后，激进共和党人曾试图在南方

推行彻底的“激进重建”，计划没收种植园土地并分给获得自由的黑人，即那个人人向往的“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的著名设想。但这一带有强烈平均主义色彩的土地改革提案，在北方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狂热保护面前，最终在国会仅获得了惨淡的37票赞成。

激进重建的失败，意味着缺乏经济基础的黑人政治权利迅速沦为空壳。随着1876年海斯-蒂尔登妥协的达成，北方资本迅速与南方重新崛起的白人精英达成了一种隐蔽的保守联盟。旧的政治强制虽然在名义上被废除，但南方迅速通过分成制和雇农制，以经济和法律的双重手段在实质上让黑人重新戴上了锁链。这场“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未竟事业，至今仍在美国的种族与阶级冲突中留下了长长的阴影：

「对于大多数南方人来说，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与日常经验以及他们出于正当而又充分的理由创造出的事实相抵触。面对北方指责的压力和世界范围内废除奴隶制的趋势，南方为这一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教条式的辩词。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关于自由的资产阶级概念对于南方人来说是危险的颠覆性的主张，因为它们触及了南方制度（奴隶财产）的神经中枢。」

(二)

当巴林顿·摩尔将比较的视野从欧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先行者掉转过来，横跨大洋聚焦于亚洲的三个农业大国——中国、日本与印度时，他实际上是带着一种极其宏阔的方法论自觉，去解构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另外两条岔路：走向共产主义革命的工农道路，以及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自上而下保守现代化道路。

中国在20世纪所爆发的惊天动地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摩尔的分析框架中，绝非由于什么偶然的意识形态入侵，而是其延续了数千年的“士绅-官僚”复合体在面临现代世界冲击时必然发生的雪崩。

与西欧封建晚期那些拥有独立城堡、领地以及法权自治的土地贵族截然不同，中国的士绅阶层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必须通过高度竞争的科举制度，将自己与庞大的帝国中央官僚系统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在乡村，他们是收租的地主；在官场，他们是权力的执掌者。通过做官敛财、投资乡村土地、再用财富供养家族子弟苦读儒家经典考取功名，士绅阶层完成了一种几乎完美的利益闭环。

这种结构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后果：中国的城市贸易和制造阶级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被帝国官僚体系死死地压制在萌芽状态。对于手握古典文化知识的士大夫而言，独立商业力量的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对他们儒家道义和特权合法性的巨大挑战。只要有人通过赚取大钱就能购买到

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乃至他人的敬重，士绅阶层经历千辛万苦获得的圣贤书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因此，帝国官僚制度在面临商业萌芽时，最敏锐的本能就是通过国有垄断、课以重税和官员压榨来将其牢牢地控制在权力指缝之中。商业和土地一样，不过是用来帮助有文化的上层阶级榨取老百姓利益的工具。在这种结构下，中国的农业商品化在缺乏规模化城市市场的刺激下彻底陷入了内卷式的停滞，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用来压榨经济剩余并将之转化为地主阶层文明装备的政治工具。

既然缺乏内部转型的经济激励，当1905年帝国为了自救而废除科举制度时，整个士绅阶层的合法性来源便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抽空。随着帝国的轰然倒塌，中国乡村迅速滑入了军阀混战与土豪劣绅化的深渊。1927年后建立的国民党政权，在摩尔眼中不过是一个依靠军事统一和道德革新口号维持的“类法西斯”松散政权，它从未真正有能力或有意愿去触碰乡村最核心的农业和土地问题，地主阶层对饥寒交迫的农民的压榨反而变本加厉。

然而，中国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纽带，除了那根常常兼具起义凝聚机制的宗族血缘绳索外，一般来讲都脆弱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传统的中国村落里，一个人想要成为正式的、完完全全的村民，就必须拥有一些土地，因为土地是儒家孝敬道义和强有力亲戚关系的物质基础。而对于那些穷得无力成家、生养更少孩子且随时需要出卖儿女的无地“光棍”和贫苦农民而言，整个传统的乡村秩序不过是一个冷酷的绞肉机。正是这些被排除在正式乡村秩序之外的底层无产者，构成了中国乡村泛滥成灾、随时准备爆发的“易燃物品”。

当日本帝国的全面入侵彻底清除并瘫痪了乡村的旧有精英阶层时，中国共产党人以一种惊人的组织天才走进了这片焦土。他们通过土地改革，彻底切断了过去地主利用宗族和父系纽带对农民进行的精神与物质控制，释放了年轻一代对长辈、佃农对地主积压了数千年的刻骨仇恨。是农民提供了最终炸毁旧秩序的炸药，为城市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政党提供了征服天下的滚滚车轮，尽管这个政党最终试图达到的历史阶段，正是让农民阶层作为阶级彻底不复存在的现代工业社会。摩尔如此说道：

「中国的士绅阶层之所以没能成功地适应现代时期，并不是因为天生缺乏足够的适应能力，而是因为缺乏一定的激励因素，同时也因为他们在这一历史情况下总是能够找到可供选择的其他出路。在大多数时间里，规模足够大的市场并不存在，这使他们试图适应现代社会的这种努力无法体现出其价值。当市场真正出现的时候，在市场形成的地方，士绅阶层反而摇身一变成成为依靠自己的政治关系来收租的群体，而不是农业中的实业家。只有一小部分人走出了这一步。」

但是：

「正是这一小部分人形成了这一强大历史趋势的先锋力量。考虑到中国士绅阶层所面临的情形，

很难想象他们还能做出些什么不同的举动。就像所有正在衰落的统治阶级一样，中国的士绅阶层尽管还远谈不上是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统治阶级之一，但是其悲剧性命运仍然是可叹的。」

相较于中国旧秩序在底层的惊天大爆炸，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轨迹则提供了一幅极具东方家长制威权色彩的精巧画卷。德川幕府长达两百余年的统治，本质上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大名与武士阶层在被强行剥离土地、集中于城堡并依赖大米薪俸生活的同时，通过“五人组”制度和共同税收责任，将乡村农民死死地压制在一种极高强度的网格化控制之中。

1854年黑船来航的巨大外在危机，迅速激活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由长州、萨摩等西南大藩低级武士所主导的“明治维新”，本质上是一场在民众完全缺位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为了救亡图存而发动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明治政府所推行的现代化政策，手段极其干练灵动，却也极度冷酷无情。废藩置县和土地私有化虽然从法律上清除了商业关系在农业发展中面临的最后封建阻碍，但明治政府的根本目的，是把农民作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最核心来源。

武士阶层在被剥夺了特权后，其换取的政府公债在通货膨胀中迅速缩水，其生活水平降至原先的三分之一，而绝大多数小农则被无情地整合进了全新的“寄生地主”制度中。日本式寄生地主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通过地租和租赁制从农民身上榨取稻米并直接投入现代市场，但他们由于自身精耕细作的农业分散化特征，并未像英国贵族那样用圈地彻底摧毁乡村农民社区的完整性，也不同于普鲁士容克贵族对农民进行重新农奴化的粗暴控制。

日本的乡村奇迹般地保持了长期的稳定与高额的产量，没有爆发颠覆性的农民革命，这其中的奥秘在于明治体制高超的社会控制艺术：早期的地税改革和技术改进使增产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能留给耕种者，从而提供了一丝温饱的幻想；而村长、五人组以及尊崇天皇长辈的家长式纽带，则将任何可能的不满压制在萌芽状态。最为关键的是，错综复杂的乡村劳动分工为那些最贫苦的乡村无产者提供了一种虽然极其卑微、但却合法合规的生存空间。

然而，这种不摧毁乡村旧结构的保守现代化，其结出的政治果实注定是畸形而危险的。在经济上，日本的城市资产阶级在明治时代长期处于一种极度仰赖皇室和政府恩惠的从属地位。商人们对统治精英充满了畏惧，不得不以毕恭毕敬、甚至满怀歉疚的姿态在私下通过腐败来调和商业与政治的需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推动了日本工业的狂飙突进，农业和商业的利益被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焊接在了一起——对内以尊皇农本主义确保民众安守家园，对外则通过军队的扩张为日本赢得海外战争的荣耀。

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其“自然”与顺畅的程度远超魏玛德国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由于日本从未经历过真正的立宪民主时代，传统的忠诚、等级制度、对暴力的神秘崇拜以及对权力的顺

从，根本不需要通过希特勒式的突然平民夺权或针对特定底层群体的大规模恐怖清洗来维持。那些在欧洲工业化早期腐蚀了传统信仰的世俗与理性主义潮流，对日本而言不过是一层薄薄的舶来品。当工业化带来的阶级冲突和经济危机窒息了脆弱的议会尝试时，日本军队作为乡村痛恨财阀情绪的代言人，极其自然地利用了农民天然的反资本主义本能，将其转化为对天皇的无限效忠与对外扩张的狂热炮灰：

「在日本式的法西斯主义中，军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一样的社会势力，同时扮演了一个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军队不一样的政治角色。在德国，军队是一批并不同情纳粹的传统精英分子们的避难所。除了1944年，在眼看着就要输掉战争之时军队曾经发动过一次针对希特勒的流产了的阴谋之外，德国军队不过是被希特勒操控的一个被动的技术工具而已。将军们担心并抱怨战争带来的后果，但是他们对希特勒仍然言听计从。在日本，对于来自乡村和来自痛恨财阀的城镇小商人们的压力，军队的敏感度要高得多。两者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日本和德国社会之间的差异。」

与德国相比：

「日本的发展相对来说是落后的，它的农业部门更重要。因此，日本的军事领导层不可能轻易地忽视他们的要求。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发现日本军队会干预政治领域，并会试图使用政变这种与德国军队截然不同的方式。」

而最让摩尔的方法论框架显得趣味盎然又充满伦理刺痛的，当属印度这个被他视为试金石的“第四种类型”。印度提供了一个在没有经历过任何深刻的、暴烈社会革命的情况下，如何长期维持着一个西方议会民主外壳、却在内部任由社会发展彻底停滞的极端负面样本。

莫卧儿王朝留给这片土地的遗产，是一个极度具有掠夺性的农业官僚制度。皇帝通过随时没收官员财产来抑制任何潜在的本土资本积累，而犹如铜墙铁壁般的种姓制度，则使中央政权的更迭在乡村社区面前变得形同多余。当英国殖民者为了方便税收而在这片土地上推行所谓的“永久和解”法案时，他们实际上在无意中催生了一个极其庞大、贪婪的本土寄生式地主阶层。这些印度地主完全不需要像英国地主那样去改良技术或投资工业，他们只需要熟练地利用英国人带来的法庭诉讼程序以及种姓制度的古老传统，就能从那些极度困苦的农民身上榨干最后一滴油水。印度的农民同样在为了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但荒谬且悲惨的是，这个国家由于缺乏工业转型的动力，社会整体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哪怕一丝一毫的发展收益。

甘地所领导的非暴力民族独立运动，在摩尔看来，本质上是一场在政治上极为高超的“阶级调和”魔术。甘地用简陋的纺锤作为象征，成功地唤起了亿万农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民族情绪，但他同时又以一套极具罗曼蒂克曲解的“受托人职责”理论，小心翼翼地安抚着本土的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将任何试图在乡村开展的阶级斗争统统谴责为法西斯主义。这使得民族独立运动在获得

了浩瀚民众基础的同时，却极为完美地避开了对任何既得利益集团的实质性威胁。

独立后的印度，其农业政策在乡村寡头极具弹性的抵触面前遭遇了全盘的惨败。所谓的社区发展计划，带着一种极其天真且傲慢的西方自由主义预设，认定农民一旦在统计数据上看到好处就会自发地采纳新技术。然而在现实的乡村权力图景中，任何试图修建灌溉水箱或推广化肥的举措，都会因为可能削减地租或威胁到上层种姓的绝对权威而遭到死守不放的抵制。官僚阶层坐在干净的办公室里与农村社会彻底隔绝，所谓的民主进程因为“过于缓慢”，最终沦为了基层官员为了取悦上级而制造一堆诸如“所挖堆肥坑数量”之类空洞而虚假的统计数据的游戏。

如果说真正的民主意味着一个理性的人能够有机会有意义地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在污秽和疾病缠身的印度乡村，这种民主从来就只是一句极其讽刺的空话。印度大米产量在独立后的十五年间几乎毫无增长，仅为精耕细作的日本的三分之一，而1943年孟加拉饥荒中惨死的150万条冤魂，便是这种所谓的“缓慢民主”在历史账簿上留下的最触目惊心的赤字。在这里，形式主义的民主非但不是社会变革的发动机，反而沦为了上层阶级为了拒绝任何实质性土地改革而提供合理化依据的最高意识形态遮羞布：

「有必要指出，如果民主意味着一个理性的人在决定自己命运时能够有机会有意义地发挥作用的话，那么这种民主显然并不存在于印度的乡村。印度农民尚未获得进入民主社会的物质和思想上的必备条件。正如我早先指出的那样，村务委员会的“复活”主要是一个浪漫的说法而已。事实上，社区发展计划也是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的。推行这一计划的那些人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推行他们关于民主的理想，其结论是民主进程“过于缓慢”，因而更多地以“结果”——通常是诸如所挖的堆肥坑的数量之类的空洞统计数据为导向采取行动，并以此来取悦于上级。」

「计划是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这些计划的具体内容。如果民主意味着不管对象群体受其历史影响，变得多么无知或残酷，任何对其生活方式的干预都是必须被禁止的，并且人们有权就这一点批评政府。那么抱有这种形式主义民主概念的人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大部分农民都是不想要经济发展的。而他们不想要经济发展的原因，我已经试图解释过了。」

(三)

当我们将这英、法、美、中、日、印六幅用长时段历史质性比较重构出的宏大画卷合拢时，摩尔在第七、八、九章中所凝练出的一般性理论，便如同一组不带任何修饰的工业齿轮，轰鸣着咬合在一起。他向世人揭示了法西斯主义与农民革命这另外两条道路背后最冰冷的社会学动因。

法西斯主义这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其本质从来不是什么偶然的狂人政治，而是“强制劳动的农业制度”在跨入工业门槛时，与城市精英必然结成的反动联盟的产物。无论是像普鲁士容克贵族那样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对农民进行粗暴的重新农奴化，还是像日本式寄生地主那样利用传统的社会组织与家长制传统对农民进行密不透风的精细榨取，这类强制劳动的体制都需要一个共同的生存温床：一个极度强大、崇尚军事传统且对等级和服从进行神秘崇拜的高压国家机器。

当19世纪工业化的浪潮不可阻挡地席卷而来时，由于这两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力量在政治上都过于微弱，他们面对强大的传统土地贵族，最终作出了一个极其犬儒的阶级选择——“用统治权交换发财权”。他们主动投靠旧有的封建军事官僚，推行了一场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些半议会制的政权虽然在工业产量、全民教育和政治秩序整顿上取得了让全世界侧目的“极大成就”，却在根本上拒绝改变乡村那套充满了剥削的旧有社会结构。

法西斯主义的核心秘密，就在于它极其高超地“将反动和保守主义大众化”。它精准地捕捉并利用了乡村小农和城镇小商人对现代大企业、银行家以及城市世俗知识分子的那种天然、朴素的反资本主义焦虑与仇恨，通过一套诸如“血与土”的罗曼蒂克农本主义意识形态将大众狂热地组织起来，然而在历史的后台，这套体制最终服务和取悦的，却依然是大工业资本家与军阀的垄断利益。

而那场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的农民革命，其爆发的最深层根源，也绝非如传统量化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时的经济恶化、天灾人祸或者宗教狂热。摩尔用一个极其精妙的“海星”类比，向我们展示了农业社会结构的抗震机理。印度社会就像一只没有中枢大脑的海星，由于种姓制度在基层的极度碎片化，底层的任何反抗和不满都可以通过在内部衍生出“另一个全新的种姓”而被这片泥潭悄无声息地吸收与分化。

然而，那些依赖强大的中央官僚集权体系来强行榨取农业剩余的农业官僚社会——比如沙皇俄国与晚清及民国时期的中国——则必须维持一个高度敏锐且脆弱的“大脑”。一旦中央政权在战争或财政危机中丧失了对富裕农民中上层阶层的控制与支持，或者传统的土地贵族试图通过巩固封建旧有义务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经济地位时，将农民社会与上层阶级捆绑在一起的剥削性制度纽带便会发生极其惨烈的断裂。

乡村的阶级社区团结，一旦在长期面临重压的社会结构中走向了激进型的周期性重新分配或者边缘化无产者的彻底对立，那些长期被旧秩序排斥在边缘、连基本的孝敬道义都无力维持的底层穷人，就会在遭遇外来知识分子或城市激进政党的组织与领导时，释放出排山倒海般的巨大破坏力。然而，农民革命的悖论与最深沉的悲剧恰恰在于，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苦大众，虽然在历

史的关键节点上用自己的血肉为推翻旧体制提供了最致命、最无可替代的火药，但当新政权为了追求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而开始全速推进现代国家的大工业建设时，这些曾经的功臣，却往往在无情的国家剪刀差和集体化浪潮中，再次无可厚非地成为了最首当其冲的、最主要的制度牺牲品：

「一个国家里怀有不满情绪的农民究竟能够找到什么样的联盟，完全取决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特殊的历史情境；这些因素同时也决定了这些联盟最终背叛农民运动、削弱其力量甚至对其进行镇压的确切节点。」

在这场跨越了数百年历史与数个文明板块的精细解构之后，巴林顿·摩尔在全书的后记部分，为世人奉上了一篇堪称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震撼、也最具有思想穿透力的道德反思与方法论宣言。他在这里展示出了一种极其干练直白、绝不絮叨却又充满人味的灵动笔法。

他首先以一种近乎傲慢的清醒，将枪口对准了当时在社会科学界极其流行的“文化价值观解释”的循环推理。摩尔极其厌恶那些动辄将一个国家的制度归宿归结为“文化价值观”的浅薄论调。如果我们在历史的研究中注意到某类土地贵族拒绝进行商品化经营，我们绝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因为他们的贵族文化在过去就是这么做的”来作为解释的终点。这种自我循环的论证不过是思维偷懒的遮羞布。

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追问，必须是去探究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社会经历、阶级博弈与物质利益，这一阶层才在历史的摩擦中形成并长期维持着这种独特的观念。社会科学中那种认为社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无需解释的“惯性假设”，在摩尔眼中同样是荒谬的，因为任何一种看似稳固的价值体系和连续性的维持，在后台都需要海量的暴力、系统性的胁迫以及日复一日的意识形态灌输来提供能量。

摩尔同样以一种极具冷幽默与讽刺的笔调，解构了历史上那些被统治阶级奉为神圣的意识形态玩具。土地贵族固然在历史上贡献了某种反对专业化、追求广泛理解的“业余者”理念，为人类的审美独立和对纯粹财富崇拜的批判保留了一丝高贵的火种，但在现实的政治图景中，传统贵族对思想的窒息同样是毁灭性的，因为历史的真实规律是，在乡村每出现一个博学高贵的罗素，往往就意味着同时在庄园里豢养了二十个傲慢、反智且保守暴虐的“布林肯上校”。而那套在罗马加图时代、普鲁士容克、日本农本主义乃至蒋介石统治时期的中国都屡见不鲜的反动意识形态——“加图主义”，其本质不过是强制劳动农业制度在面临现代冲击时最拙劣的垂死挣扎。它通过一种近乎罗曼蒂克的温情去曲解和美化过去的乡村生活，歌颂农民的纯朴、推崇盲目的军国主义、疯狂地排斥城市文化与理性的世俗主义，然而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对农民最赤裸裸的制度性剥削，并最终利用农民盲目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去死死地捍卫大企业和旧军阀在现代世界的特权。

相反，那股由英国掘土派、法国巴贝夫以及俄国民粹主义者一脉相承、在泥土里挣扎而出的农民激进主义，虽然带着某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空想，却向整个人类资产阶级社会掷出了一个最为震聋发聩的平等主义批判：当富人仍然能够依靠财富和制度在事实上压迫穷人的时候，你们那套写在纸上的自由民主，究竟能有什么意义？

而最让每一个读到此处的读者感到指尖冰冷、心口大恸的，正是摩尔在全书结尾处，用一种剥离了所有意识形态神话的克制姿态，直接逼视并推演出的那个关于现代世界的、最沉重也最无情的暴力的悖论：

「在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下，客观公正的法律这一观念彻底消失了。在法西斯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中，其中一条就是对人道主义理想的粗暴抛弃，包括对任何潜在的人类平等理念的粗暴抛弃。法西斯主义观念不仅强调不可避免的等级、纪律和服从观念，而且还断定这些观念都具有天经地义的价值。关于同志关系的罗曼蒂克理念勉强地与这种观念相契合；这是因为顺从而形成的同志关系。法西斯主义的另外一个特征是推崇暴力。这种推崇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对暴力在政治中所呈现的实际重要性的理性而冷静的评估，到了“为强硬而强硬”，对“强硬”进行神秘崇拜的地步。」

「鲜血和死亡总是会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吸引力，当然，在其尚未受到极度推崇的时期，法西斯主义尚属比较“健康”和“正常”，承诺大家回到温暖的资产阶级式甚至是前资产阶级的农民式母亲的怀抱中去。」

摩尔扯碎了所有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神话，他让我们直面现代化的真正代价。他以一种极其宏阔却又精细的历史账簿，向整个人类的良知提出了那个至今无人敢正面回答的问题：现代化的代价至少与革命的代价一样令人震惊，甚至可能更为严重。如果我们习惯于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暴力革命指手画脚，那么请你转过头去，看看那些不发生革命的道路上，究竟在流淌着怎样的血水。

英国选择不发生激进革命的代价，是圈地运动中无数农民生活方式的彻底毁灭与肉体消亡；德国与日本选择在旧体制内维持“秩序与渐进”的保守现代化代价，是整个国家最终滑向法西斯主义的狂热，并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数千万无辜生命的惨烈战火；而印度选择在表面上维持那套温和、不触动任何地主利益的“缓慢民主”的代价，是每年都有数百万穷人因为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饥馑与社会冷漠而在污秽中默默死去。这种以微弱却漫长的隐蔽暴力维持的常态，在历史的长时段账簿上，其血腥与残酷的程度，绝对不亚于任何一场暴烈大革命的瞬间爆发。

然而，摩尔的这种清醒，也绝对不包含任何对革命的廉价崇拜与美化。他同样冷酷、干净、直击

要点地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在后来的建设中所展现出的巨大恐怖。斯大林统治时期那范围之广、深度之深的官僚压迫与社会清洗，其残酷的程度早已无法用任何一种“革命的必要性”来在道德上进行苍白的辩护。农民为了推翻旧世界流尽了血汗，却在随后的国家机器现代化建设中，被集体化和国家剪刀差无情地剥夺了所有的发展果实。这构成了整个人类现代化历史最为黑色、也最令人窒息的终极反讽。在人类跨入工业文明的这场大剧里，从来就没有一个阶层能够微笑着全身而退。

历史的真相是极其残酷的：在长时段的史料考证面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切实的证据能够表明，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在过去是真的打心底里想要一个充满烟囱、工厂和异化劳动的工业化社会的；相反，倒是有着太多的、充分的证据表明，那些守着传统乡村微薄土地的普通人，在骨子里压根就不想要一个这样的社会。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到来，从来就不是大众自发选择的福祉。归根结底，迄今为止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形式的工业化转型，本质上都是一场场由冷酷无情、手握资源的少数人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革命，是一场少数精英为了国家的生存与自身的特权，以抹杀和碾碎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为代价而玩弄的冷酷把戏。

在学术的血缘上，他无疑是一位迷人的异端——他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徒，却极为深刻地借用了阶级博弈与经济基础的解剖刀，将地主、农民与资产阶级的撕扯定格为历史的引擎。但他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割裂又是如此决绝：他从不迷信生产力必然催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宿命论，在摩尔的星图里，民主、法西斯与农民革命是三条地位平等的历史岔路，前路并没有预设的终点；那句掷地有声的经典论断——“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更是狠狠地冒犯了那些将中产视为过渡阶级的传统信条；他将聚光灯从城市码头的工业工人身上移开，硬生生把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农民推到了现代化转型的暴风眼；更重要的是，这位学者骨子里毫无改造资本主义的宏大革命诉求，他终其一生所寄托的理想，不过是改良型的自由民主政体。

尽管这本书的骨架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在寂寞中成型，其核心也全然未受60年代街头运动的沾染，纯粹源于一个学者对冷战政体叙事的反思。可命运的戏剧性在于，当它在1966年正式面世时，恰逢美国民权运动的烽火、反越战的巨浪与新左派思潮的喧嚣轰然而至。书中那对西式民主神话的无情祛魅，对制度合法暴力的辛辣解构，宛如一记响亮的耳光，精准地扇在了那个时代反思浪潮的痛点上，遂借着社会思潮的东风迅速爆红。摩尔用七国泥土里的博弈证明了一件最朴素也最残酷的事：现代政体从来不是什么自然演化的温情礼物，它通体流淌着阶级博弈与社会暴力的血水，而这一认知，最终为后世的比较政治与社会转型研究，奠定了最坚固、也最无法绕过的理论根基。

在这部合拢的巨著面前，巴林顿·摩尔没有留给我们哪怕一丁点儿可以用来取暖的安慰，他留给整个21世纪人类的，只有一个在漫长的黑暗中依然闪烁着冷冷幽光的、沉甸甸的问题。西方世界那

些曾经骄傲的自由主义，与东方曾经激进的革命叙事，在完成了现代化的建构之后，在今天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历史性退化，它们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坐享其成的统治阶层用来为现存的压迫和不公提供正当理由的、僵死的意识形态。但摩尔的悲观主义绝非让我们走向虚无的放弃。他用这一卷长达数百页的历史锁链，向每一个后来者传递了微弱却坚韧的希望：人类的命运从来不是由某种神圣的必然性所预设的，如果我们未来世界的人们真的想要在某一天冲破当下这些日渐沉重的锁链，那么在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他们也首先不得不像当年在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伏案写作的摩尔一样，扔掉所有廉价的幻象，努力去理解形成这些锁链的、那些来自于地主、农民与商业资本深处的、真正冷酷而庞大的结构性力量。



扫码进原文:

<https://ximutan.com/forum/post/26>

以书会友，谈论天下

© 西木读书论坛